

容閔《教育計劃》的實質及其影响

张 其 光

1958年《理論与实践》三月号刊发我写的《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对广东教育的影响》一文，提及过容閔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而对他的《教育計劃》未及申論。这里，特就他毕生殫精竭力求其实现的《教育計劃》作初步探討。

容閔（1828—1912年），广东人。他作为中国近代政治活动家的历史地位，是應該被肯定的。我們从容氏自传式的遺著《西学东漸記》可以看到，早在1860年他便訪察太平軍，亲到南京向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提供《富强策》；1863年又参加曾國藩的洋务运动；他又是戊戌政变的思想先导，1898年曾被推选为中国强学会第一任会长^①；他曾为中国近代資產階級提出过比較完整的綱領，确实應該肯定他是中国早期資產階級改良主义者。然而，他全部政治活动的最大理想却在实现他的《教育計劃》。他为了实现《教育計劃》而参加中国近代几次重大的政治运动。1854年容閔将要在美国耶路大学毕业的时候，便立志改造中国的教育。他說：“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則当俟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輸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溯自1854年予毕业之时，以至1872年中国有第一批留学生之派遣，則此志愿之成熟时也。”（參看容閔：《西学东漸記》第27頁。下引同书，只注頁数）因此，我們可以說：这个中国早期改良主义者，同时是中国最早的資產階級教育家。

容閔的《教育計劃》，他自己归結为派遣学生出洋留学这个措施。可是，实际上，当他向太平天国建議七事的时候，已經把它的内容提得較為具体：“一、依正当之軍事制度，組織一良好軍隊；二、設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識之軍官；三、建設海軍学校；四、建設良善政府，聘用富有經驗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顧問；五、創立銀行制度，及厘訂度量衡标准；六、頒定各級学校制度，以耶穌教聖經列为主課；七、設立各种实业学校。”（第66頁）——他認為这是关系国家富强的七件大事，把教育事业同軍事、政治和生产密切联系起来，而且把教育提得特別突出，尤其重視实业教育。其中提到各級学校以耶穌聖經为主課，当然是很荒謬的。有人認為这只是专为太平天国立言（參看1962年9月16日上海《文汇报》《論容閔》一文），我們无須为容氏辯解，他原是一个

^① 据湯志鈞編《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容閔于光緒廿六年（1900年）参加上海张园国会，被推举为会长。

虔誠的宗教信徒，這正是不少中國資產階級教育家的特點之一。

太平天國由於軍事失利，來不及實行容闈的教育主張，他就錯誤地把希望寄托于曾國藩等洋務派。首先幫助曾國藩到外國購辦機器，成立江南製造局，然後“予遂乘此機會，復勸其于廠旁立一兵工學校，招中國學生肄業其中，授以機器工程上之理論與實驗，以期中國將來不必需用外國機械及外國工程師。文正極贊許，不久遂得實行。”（第99頁）他把兵工學校的設立看成是他的《教育計劃》的“小試其鋒”，乃於1867年通過江蘇巡撫丁日昌的關係，向清廷正式提出他的《教育計劃》，還深慮單獨提議這一計劃易遭批駁，便在“條陳”里加上“組織汽船公司；設法開采礦產；禁止教會干涉人民訴訟”這三項，“特假以為陪襯，眼光所注而望其必成者，自在第二條”，那就是：“政府宜選派穎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學，以為國家儲蓄人才。派遣之法，初次可定一百二十名學額以試行之，此百二十人中，又分為四批，按年遞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學期限，定為十五年，學生年齡，須以十二歲至十四歲為限，視第一第二批學生出洋留學著有成效，則以後即永定為例，每年派出此數。派出時并須以漢文教習同往，庶幼年學生在美，仍可兼習漢文。至學生在外国膳宿入學等事，當另設留學生監督二人以管理之。此項留學經費，可于上海關稅項下提撥數成以充之。”（第101—105頁）——這個計劃，我們現在看來是很簡單；但在當時畢竟是一個進步的中國人為挽救中國尋求富強道路的大膽的設想。

在容闈提出他的《教育計劃》的前後，正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形成的時期。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運動在清政府勾結帝國主義的聯合鎮壓之下失敗了。清政府同許多西方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和商務關係。國內政治在表面上呈現了暫時的穩定，而由於殖民地化的加深，社會危機和民族危機隨之加深了。怎樣拯救“老大的中國”這個問題始終沒有解決。以“求強求富”作標榜的洋務運動，一開始便成為投靠外國資本的買辦勢力，創辦軍事工業實際上是幫助外國兵工廠擴大軍火市場，仍無法“自強”。新興的資產階級在這時候迫切地要求大力發展工商業。它的代表人物——早期改良主義者——一邊攻擊清廷封建守舊派，一邊反對洋務運動中的買辦勢力。他們尋求“富強”之道，有的認為“兵戰不如商戰”（鄭觀應語）；有的認為“不從政治改革而從船堅炮利入手以求富強，乃一種舍本逐末的辦法”（馬建忠語）；有的贊成魏源所力主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便提倡西學，這便是馮桂芬和容闈。但馮桂芬舍不得丟掉“倫常名教”，到底比容闈後進一步。而且馮桂芬的“采西學”的辦法仅限于設立“翻譯公所，聘西人授課”，倒沒有容闈的《教育計劃》所提出的派遣幼童留學那末直截了當，也就是沒有容闈那樣強烈地反映着民族資產階級“師夷以制夷”的迫切要求。所以，容闈對自己這個計劃的實現怀着美妙的憧憬：“……使予之教育計劃果得實行，借西方文明之學術以改良東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國，一變而為少年新中國。”這就揭示了他的《教育計劃》的目的。它既否定中國封建主義的文化教育，就是跟官僚地主階級洋務派“改革科舉，採納西學”而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教育主張，也存在着重大分

歧。它更不同于反动的资产阶级教育家所提倡的“为教育而教育”，“教育除自身之外并没有什么目的”。

容闳的《教育计划》无异竖起了“教育救国”的大旗，反映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企图借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文化的“威力”来发展产业，和改良中国政治社会的要求的愿望。至于他向清廷建议的其他三项意见，虽然他自己说是“陪衬”，其实和他的《教育计划》正是相配合的，更加显示容闳企图通过教育措施来达到发展资本主义产业的目的。这便是容闳的《教育计划》的实质。

为什么我们可以作出这个论断呢？我们知道，在当时同样主张向西方学习、采用西学的人们，其立场、目的和方法却是很有分歧的。洋务派站在封建官僚的立场上以挽救垂危的封建统治和勾结外国资本来达到他们的“自强自富”为目的，所以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认为“体”最关重要，丝毫不能动摇，那就是封建思想道德体系必须维持，因而在方法上着重设立同文馆、方言学堂，聘用西人教习。对于直接派遣留学生迟疑不决，反复再三，就是这个道理。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主张向西方学习，是站在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以发展中国资本主义为目的，企图“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可是究竟从何入手，这在改良派内部也是很有分歧的。郑观应就强调商务，他说：“……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见《盛世危言》卷三）；王韬却主张从改革政体，实行“君民共主”着手；唯独容闳倡导以教育为先。原本容氏还没有实行他的《教育计划》之前，也曾试图从事商务入手的。他访察太平军失望之后，“于是不得不变计，欲从贸易入手，以为有极巨资财，则借雄厚财力，未必不可图成，然毕竟营何种商业，以为致富之资乎？”（第73—74页）他果然经营了贩茶商业达三年之久，并没有真的做到“致富图成”。适值这个时候结识了曾国藩，他才希望利用洋务派来实现他的《教育计划》。而《教育计划》的主要点在于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文明，为中国“储蓄人才”，这些人才又以培养“实学”为主，使中国有自己的工程技术人才。很显然，容闳这个《教育计划》以发展中国资本主义为目的。可以说，中国资产阶级通过容闳表达它的发展资本主义所必需的培养现代科学技术人才的迫切要求。就在他的《教育计划》失败以后，容氏还继续进行兴办实业的活动，这些实业也无疑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他说：“一年前（按指1897年）余在北京时，常遇康有为、梁启超二人。当余筹划银行铁路等策时，绝不意康、梁等亦正在筹划维新事业也。”（第142页）从商务到教育，又从教育到实业，容闳处处遭遇困难，他预感到中国资本主义没有出路了。他说：“……当彼时中国资本家欲其出资入股以兴造铁路，殆难如登天，余既明知此事势有所不能，遂不得已，复将此铁路计划舍去。余之种种政策既皆无效，于是余救援中国之心，遂亦至此而止矣！”（第142页）——非常露骨地说明了容闳一生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悲剧。现在，我们来考察他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教育计划》的失败过程。

就是这么一点儿带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性质的《教育计划》，也不容易为封建统治

階級所接受。容闳的“条陈”提出于1867年，但“自1868年至1870年，此三年中，无日不悬悬然不得要领”。到了1871年曾國藩才和李鴻章聯合奏請清廷批准容闳的建議，決定派遣第一批幼童官費留學美國。在曾、李的奏折中，還反映了反對派的極力阻撓：“或謂天津、上海、福州等處已設局仿造輪船槍炮軍火，京師設同文館選滿漢子弟延西人教授，又上海開廣方言館選文童肄業，似中國已有基緒，無須遠涉重洋。不知設局製造，開館教習，所以圖振奮之基也；遠適肄業，集思廣益，所以收遠大之效也。”（參看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冊第164頁）

清廷批准了預計用二十年的時間，花費庫銀一百二十萬兩，以實現容闳的《教育計劃》，他感嘆地說：“十餘年夢想所期者，得告成功焉！”可是，他告慰得太快了。滿以為將親自實行的《教育計劃》，不久即遭受封建守舊派的諸多阻難破壞，以至中輟。當籌組留學生事務所之初，就迫得與守舊派進行妥協。“丁撫（即丁日昌）旋荐陳蘭彬于予，謂將來可副予為中國留學生監督。陳乃中國翰林，在刑部任主事垂二十年，丁撫之荐陳，蓋有深意。嘗謂余：君所主張，與中國舊學說顯然反對，時政府又甚守舊，以個人身當其沖，恐不足以抵抗反動勢力，或竟事敗于垂成，故欲利用陳之翰林資格，得舊學派人共事，可以稍弭阻力也。”（第106頁）後來事實上這個在當時帶有進步性的《教育計劃》已落到極守舊的封建官僚手中一面“實行”、一面破壞。第一批留美學生三十人於1872年夏季前往，最後一批學生於1875年秋間抵美。這時清廷已調派陳蘭彬為駐美公使，把容闳調任副公使，並由陳蘭彬推薦更加頑固守舊的吳子登繼任留學生監督。“吳既任監督，而留學事務所乃無寧歲矣！”（第121頁）1876年秋，吳子登向清廷報告，指責容闳“縱容學生，任其放蕩淫佚……此等學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國，必致全失其愛國之心，他日縱能學成回國，非特無益于國家，亦且有害于社會。欲為中國國家謀幸福計，當從速解散留學事務所，撤回留美學生。”（第121—122頁）此後又因容闳向美國政府提出選送數名學生入美國陸軍學校肄業被拒絕，“吳監督子登聞之，遂又乘風興浪，思設法以破壞留學事務所。”（第125頁）清廷守舊派多方支持吳子登的破壞活動。“此百二十名之學生，遂皆於1878年淒然返國。”（第126頁）容闳的《教育計劃》就是這樣遭受中國封建守舊派的打擊而挫敗的。“畢生志願，既橫被摧殘（指《教育計劃》）……頓覺心灰，無復生趣。”——這固然是一個資產階級教育家的悲鳴，也具見中國資產階級在發展資本主義事業上一開始便走投無路，它的美妙的儘管又是“偉大”的幻想，終於破滅。

容闳的《教育計劃》雖然“淺嘗輒止”，終歸失敗，可是對於近代中國教育事業的影響卻相當深遠。

容闳的《教育計劃》的初步實行以至終歸失敗，這反映了中國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教育思想同中國封建地主階級的傳統教育思想之間的搏鬥。資產階級的教育理想固然遭到挫敗，而反動的封建主義文化教育並未能逃脫它的沒落的历史命運。腐敗的科舉制度終於廢除，設立學堂、採納西學，都是封建勢力在教育上的妥協。官費派遣留學生的措施雖然中止了，可是競相游學外國的仍然大不乏人。清廷迫得復於1899年和1902年再頒

派遣出洋留学章程。到1917年，单是“留美学生，数殆二千。”（参看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74—178页，下册第882页）

容闳本身虽是最早的留学生，但还不是官费派遣留学的。他幼年在澳门“西塾”学习，后得英国教士和美商的资助赴美留学，到了入耶路大学攻读的时候，已经成了工读学生，做了同学的炊事员和“兄弟会藏书楼”的司书，学费和膳费都赖以补给。自清廷放弃了容闳的《教育计划》，停派留学生之后，许多贫苦青年便走“工读互助”的道路。

“以半工半读为助成学业之方法，以节省费用为推广留学之方法。”1912年就产生“留法俭学会”，1915年有“留美勤学会”。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受过容闳和他的《教育计划》的影响。

曾国藩死后，容闳的《教育计划》虽然中止实行，但对洋务运动的影响依然很大。洋务派首领之一的张之洞继容闳之后，于1893年仍力主“游学”。他认为游学的意义和作用在于：“明时势，长志气，扩见闻，增才智，非游历外国不为功。”“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张之洞这样强调留学的好处，可是他对容闳的《教育计划》作了重大修改。他说：“游学之益，幼童不如通人，庶僚不如亲贵。”这和容闳的主张恰恰相反。容闳要求在南方闽粤沿海城市选拔贫苦聪慧的幼童派遣留学，用意在于挑选市民阶层的子弟，他们从未受过中国旧教育的影响，以便更彻底地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教育，使中国的社会文明达到“全盘西化”。而张之洞却坚持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要求选送有旧学根底的“通人”而且属于“亲贵”，才算合格。张之洞还针对容闳的《教育计划》予以指责：

“或谓昔尝遣幼童赴美学习矣，何以无效？曰：失之幼也。”这是容、张在教育事业的阶级路线的分歧。（此段所引张文均见张之洞：《劝学篇》）

后来接受容闳的教育主张并有所发展的，倒是另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严复。

严复在维新运动的政治斗争上是保守的，而在改革教育提倡西学却是急进的。可以说，严复在“西学”问题上力排众议，独赞和容闳的主张。他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开头便说：“夫中国之议学堂久矣，虽所论人殊，而总其大经，则不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西政为本而西艺为末也’，主于中学以西为辅所不足也，最后而有‘大报’‘学在普通、不在语言’之说。之数说者，其持之皆有故，而其言之则不必皆成理。”接着严复提出自己的见解：“吾闻学术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后得其真。”便是主张必须出洋留学。“中国所本无有者，西学也，则西学为当务之急明矣。且既治西学，自必用西文西语而后得其真。”严复的着眼点着重在“得其真”，无论学取“西政、西艺”，都求“得其真”，便须留学和掌握语文工具。严复认为“以西学为要图”，“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在此。”这和容闳的基本见解很一致。但严复与容闳的见解不同的地方，在于学习西学的内容问题上。容闳着重“实学”，亦即“学艺”——自然科学，所以大力倡办实业学校，这是同新兴资产阶级发展产业的要求相适应的。而严复着重“玄学”、社会科学，把自然科学放在次要地位。他说：“……须知学问之事，其用皆二：一专门之用，一公家

之用。何謂专门之用？算学则以核数，三角则以测量，化学则以制造，电学则以电工，植物学则以栽种之类，此其用大矣；然而虽大而未大也，公家之用最大。公家之用者，举以炼心制事是也。故为学之道，第一步则须为玄学，玄者悬也，谓其不落边际，理该众事者也。”“……群学之目，如政治、如刑名、如理财、如史学，皆治事所当有事也。凡此云云，皆炼心之事；至如农学、兵学、御舟、机器、医药、辨务，则专门之至溢者，随有遭遇而为之可耳。”（上引参看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第983—1008页）在这里可以看到，严复继容闳之后提倡西学，对于容闳的教育主张有了补充和发展。

作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一种政治、文化要求的容闳的《教育计划》，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同时具有很大的软弱性。它的进步作用在于反对封建文化学术的“闭关自守”；它对于沟通中外文化、吸取近代世界科学知识，培养了一批科学技术人才，起过积极作用。它的软弱性亦即它的妥协性，首先表现在它缺乏鲜明的政治内容，未敢揭示战斗的民主主义教育旗帜，依靠人民群众来发展现代教育。相反地，容闳在拟订和实施他的《教育计划》的过程，始终依附曾国藩、李鸿章等官僚地主阶级“洋务派”，作过不少妥协。容闳虽然是个爱国主义者，他的《教育计划》企图通过派遣幼童留学美国，“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可是他对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资本主义美国已经逐步变成帝国主义国家毫无认识，他的良善的愿望适足以美帝国主义文化教育侵略所利用而不自觉，所以支持他的《教育计划》继续实行的美国耶路大学校长推崇备至。容闳不认识也不可能认识“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的道理，始终沉浸于学习西方的迷梦之中。至于往后反动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教育家”、“学者”曾借着“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公然大倡“全盘西化”，实际上就是帮助帝国主义使中国全盘奴化，倒不是容闳“始料所及”的，这虽然不能完全归罪于容闳，在客观上却是极恶劣的影响。

容闳的《教育计划》的失败是必然的，它随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破产而破产，那是历史判定了的。而他的《教育计划》的失败教训，又正好作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走投无路的例证。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企图承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文化学术来“自救图强”，无疑是一条死胡同！企图凭借封建官僚势力来推行“西学”、“救国”，也完全是梦想。容闳的《教育计划》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为历史所埋葬的。当然，派遣留学生这一创举在当时是起过吸取现代科学技术的作用的，例如詹天佑学成归国以后兴办铁路有过重大贡献，应该加以肯定。不过通过派遣留学生来学习现代科学的措施是好是坏，决定于究竟为谁服务，为了促进中国社会向前发展还是借此帮同帝国主义奴化中国。这还须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我们应当肯定容闳的《教育计划》中的一些积极因素，而坚决清除它导致“全盘西化”的奴化教育的恶劣的影响。

1962年12月